

作为媒介的“驿壁”:精神交往与地理想象

文远竹 沈亚圆

摘要:作为一种“地方性媒介”或“地理媒介”,驿壁是借助中国古代强大的驿传系统而衍生的独特媒介形式,是公共性、地方性的意见表达场所。驿壁传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现象,唐诗宋词依托驿壁而流传四方。驿壁也是古代文人精神交往的媒介,他们在这里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在驿壁之上出现了“媒介—人—地理”的互动与重合,驿壁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形成新的共识感,构建起一块充满文化元素和心理期待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驿壁;驿传;媒介地理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5-0060-09

项目基金: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课题(2022GZDD10);广州城建职业学院重点课题(2022SKZ01)

在报刊等大众传播不发达的古代中国,驿传系统(又称邮驿系统)是官方设置的交通形式,是官吏、文人、将士、商贾等的集散地。西周时期驿传系统已初具规模,直到清代末年,在古代中国绵延二千多年的驿传系统才逐渐被西方近代化的交通、电报、邮政所取代。此前学界对于驿传系统的传播功能有大量的论述,还有不少专著问世。如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一书中辟有一章《邸院与驿传》论述唐代驿传系统的传播功能。^[1]与驿传系统密切相关的驿壁,是指驿站、驿馆、传舍、邮亭等的墙壁、廊柱、诗板,是文字书写和信息传播的载体。驿壁上发表和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包括少量的图像符号,由于流传下来的极少,本文主要讨论驿壁上的文字信息。驿壁常常带有后来“语录墙”“宣传栏”“黑板报”“留言板”等信息发布的功能。199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敦煌悬泉置汉代驿所遗迹,出土了驿壁题记《四时月令诏条》。这篇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文字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太皇太后发布的诏书,内容是强调“以时禁发”“用养结合”为原则的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2]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驿壁文书。《太平御览》引《风俗通》称:“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辅(补)正多有阙谬。”^[3]由此可见,早在汉代,驿壁就已经成为政府发布政令等官方信息的载体。汉唐以降,这种政令发布的方式因其便捷性和有效性一直沿用。驿壁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此前学者对这一方面的论述较多,如孙朋朋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宋元时期粉壁社会功能的演变^[4],粉壁与驿壁都是经过粉刷处理后可用于书写的墙壁,广义的粉壁包括驿壁;徐燕斌、杨军分别从法律传播史的角度探讨了粉壁作为汉、唐、宋几代法律文书“布之于民”的形式之一及其相关特征^[5-7]。这些研究涉及驿壁,但没有将带有民间性的驿壁与通常在衙署、闹市等处发布政令、张贴榜文的粉壁进行区分。本文拟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于围绕驿壁展开的意见流布、文化传播、精神交往和因空间流动而带来的地理想象。

20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媒介地理学,是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相结合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一方面,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态与个性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介凭借其对地理的命名与叙述,使真实地理的呈现充满了想象与虚构。”^[8]媒介地理学强调地理空间与文化生

产的关系以及人类同媒介、地理的互动,这为窥探驿壁这一古代中国独特传播媒介的全新视角。

一、社会交流空间:意见的流布与地方感的涌现

驿壁除了履行一部分粉壁、榜文等承担的官方政令发布职能外,还因其自身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成为士人群体品评时事的重要渠道,形成与政令传布相对的下情上达的传播回路。例如,晚唐孙樵的名篇《书褒城驿壁》就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时评。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元朝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1340年),太师伯颜专权自恣,贪财枉法。后来失势后,被贬南恩州阳春县,在途中病死于江西龙兴路,寄棺驿站。有人在驿壁上题诗:“百千万定(锭)犹嫌少,堆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9]这则打油诗表达的是老百姓对权臣伯颜贪得无厌的讽刺。该书还记载不少士子因驿壁题诗“发牢骚”而被“系于狱”的故事。大约编纂于宋理宗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的判例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记载了不少南宋时期因在驿壁题写“鼓惑众听”等反对意见的“远乡怪民”“乱政之人”遭到官府“戒约”“押出本县界”等惩处的案例。^[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驿壁作为一个地理特征较明显的媒介,成为在野的士人群体“发声”的场所。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流虽然是不对等的,但在古代社会管控严密、信息上传渠道不畅的背景下,这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民间意见表达方式。

有的驿壁诗如“官箴”“警句”“格言”,题写在驿壁的显眼位置,有如当代的标语,让来往行人有所警醒。北宋赵令畤所著《侯鯖录》有载:“宗弟鹏举言,见一驿壁上有诗云:‘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船。’此征途药石也。”^[11]这既是在奉劝来往旅人要遵循安全行路的常识,也是在宣讲世事“莫争”的哲理。南宋“豪放派”词人张孝祥有一次途经江西萍乡,在一个无名驿站旁看到一棵百年杉树,凛然有正色,有感而发,作了首“官箴诗”题在驿壁之上。诗云:“此杉已百年,林立官道侧。鬼神所呵护,斤斧不敢迫。爱此遗直姿,凛凛有正色。未云支大厦,聊以荫行客。作诗调令尹,为我驿壁刻。但使杉长存,悬知令清白。”^[12]张孝祥此举在于警示沿途官吏士子应像百年杉树一样保持“直姿”“正色”“清白”的形象,自省自律,造福百姓。由此看来,驿壁成为驿行者感慨世事、点评时政、直抒胸臆的一扇窗口。

驿壁上的文字有些事关公益事务和公共管理。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说到大庾岭南北驿道往来题壁者鳞次栉比:

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吴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曰梅岭之号,今荡然无一株,遂市三十本,植于道之左右,因留诗于寺壁。今随夫任端溪,复至此寺,诗已为圻馘者所覆,即命墨于故处。”诗曰:“滇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辍俸买栽三十树,清香留与雪中开。”好事者因此夹道植梅多矣。^[13]

一位北宋时的吴州司寇路过梅岭时不见梅,便买了30棵栽种在驿道两旁,并在驿壁上题诗记载。多年之后,当年跟他一起赴任的幼女已为官人妇,再次路过驿站,见父亲驿壁诗已被涂墙的人涂抹掉了,便让人在旧处重新题写,并写了篇题记,记叙原委。这一题记故事性强,既有父女之情,也有爱梅之意,实乃一篇绝佳的“倡议书”。从实践来看,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倡导效果——“好事者因此夹道植梅多矣”。而今梅岭多梅,或许得益于北宋这篇“倡议书”。这篇“倡议书”没有官方背景,受其触动而“夹道植梅”的实践行动也纯属自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大庾岭南北驿站人流量广、高端人群多、关注度高,是一个拥有较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民间信息发布和交流媒介。

驿壁发布和传播的信息没有经过邸吏、访员、信使、提塘官、塘拔等专业人员的编辑加工和发行传递,其内容生产过程不像邸报等媒介受到以定本为代表的朝廷管理制度的限制,而是由传者自发题写发布,受众自发传抄转发,是一种兼具媒体公共性和社会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模式。相对于邸报、宫门抄、揭帖、榜文等官方的媒介,驿壁这一媒介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地方性特点。驿壁信息的受众

以经行驿站的士绅、犯官、流民、商贩、戍卒等不特定群体为主。在信息传播方面,除了授权发布类似《四时月令诏条》之类的官方通告外,驿壁上的文字大多是驿行者有感而发的针砭时弊之作,或目的性、指向性较为明显的劝谕之作,其匿名性、草根性的特点较为明显。以驿壁为中心形成的意见表达,改变了传统的官民之间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格局,打破了邸报等官方媒介对信息发布的垄断局面,在一定意义上,驿壁得以成为社会的“公共读物”。在以驿壁为媒介进行的阅读和传播过程中体现出的这种“公共性”,以及驿壁上发布的某些信息内容具有批判现实的舆论监督意义,让它具有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某些特点和雏形。

把驿壁媒介与地方性放在一个层面来思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驿壁媒介自身的地域属性,二是驿壁媒介与地方之间在文化心理层面体现的影响或互动关系。在地域属性方面,驿壁固着在特定的地理方位中,深深地打上了地方的烙印,像“褒城驿”“孟城驿”“鸡鸣驿”等驿站都与所在地名捆绑在一起。驿壁是驿站这一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驿站又是特定的地理方位和周边自然环境中的一个节点,因而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驿壁离不开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空间背景。驿站所在地的山川草木也成为驿壁文字反映的对象,传者在驿壁上题写的诗文几乎都与所在地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有关,可以将其称之为“地方性媒体”或“地理媒体”。在文化心理方面,驿壁的地方性更多地体现在驿行者对地名、地方和地方文化的感知上。像“褒城”这一地名随着《书褒城驿壁》等文字流传下来,甚至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符号,驿行者或驿壁文字的阅读者在驿壁的题写或再传播中,感受着“褒城”这一地名所蕴含的地理特征、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驿壁开辟了一块让行走在驿路之上的人群感知地方的空间。从前引张孝祥的驿壁诗和“官人妇”重题父诗两则例子可以看出,驿壁上发布的信息,感言也好,议论也罢,大多是驿行者与其所处的世界和地理环境有关的第一手经验。正如加拿大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所说,这种展现地方的地理现象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关系的个人第一手经验对地方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时空以这种方式得以展开和承续。^[14]传者与受众在传播和阅读驿壁信息内容时,加强了对地方的感知、想象和认同,亦即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或“地方感应”。^[15]用索杰的话来说,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这些有关概念,它们组(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16]

二、文化传播空间:诗文的媒介与地方文化的建构

古人有在名胜古迹、酒楼茶馆等公共场所墙壁上题诗留言的传统,所谓“素壁题诗”“雪壁题诗”等,成了一种雅好和时尚。在报刊等公共传媒还没有盛行的古代,驿壁成了文人墨客发表诗文、咏物抒怀的“文学园地”。

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是行旅诗人,他们用诗来表达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杜甫有诗:“东郡时题壁,南湖日扣舷。远游凌绝境,佳句染华笺。”^[17]孟浩然也有“染翰聊题壁,倾壶一解颜”^[18]的句子。将白天远游途中吟成的佳句,晚上在驿站投宿时题写在驿壁上,已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文化生活习惯,这也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现象。当然,这种传播方式也与中国古体诗词简洁精练、朗朗上口的音韵美和汉字书法独具的形体美息息相关。文学史上许多名篇佳作其实最初都是诞生在驿壁之上,并通过南来北往的行人自发传抄而流传下来的,大多是文人灵感闪现,即兴口占之作,有些甚至作者成疑。宋代诗僧文莹编撰的《湘山野录》卷上记载了一首“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19]的词作:“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19]又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19]该词作艺术价值甚高,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有学者分析认为,《菩萨蛮》是晚唐才出现的词牌,李白是盛唐诗人,不可能写出此词。这一驿壁题词很可能是在鼎

州(今湖南常德)沧水驿投宿的某位文人佚名之作,几经流传被后世托名在李白名下。这首作者无法考证的驿壁词作之所以备受推崇,可能是词中“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表达的思乡情愫、旅途艰辛激起了广泛共鸣。这种羁旅之思是驿壁诗文的重要主题之一,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之特殊体裁——“驿壁诗”。成书于宋理宗年间的《玉林诗话》后散佚不传,现存佚文共29条,其中就有“壁间诗”条目:“先君尝于逆旅间录一诗云:‘山行险而修,老我驂且羸。……’盖学简斋诗法者,莫知为何人作也。”^[20]可见,古人虽有题写和传抄“驿壁诗”的风气,但“驿壁诗”大多不署名,或为即兴所作、有感而发,或为记录见闻、针砭时弊,或为唱和应答、嘲谑戏语,大多是文人打发旅途寂寥的闲题,因少了些功利心,反而是真情流露和实景写照。清代文学家王士禛在其《香祖笔记》中忆及年轻时赴京赶考途中常在驿壁题诗的事:

余自少年与先长兄考功,同上公车,每停驂辍轭,辄相倡和,书之旗亭驿壁,率不留稿。诸同人见之者,后在京师,往往为余诵之,恍如昨梦。近见吴江钮玉樵(琇)《觚剩》亦载余逸句。因忆丙午自里中北上,戏题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绝云:“曲律店子黄河崖,朝来一雨清风霾。青松短壑不能住,骑驴又踏长安街。”语虽诙谐不足存,亦小有风趣,聊记于此。^[21]

王士禛的驿壁诗“率不留稿”,而“同人诵之”,还有《觚剩》一书为之转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驿壁诗”是如何传抄流布的。绝大多数“驿壁诗”被岁月尘埃湮没不闻,像上面《玉林诗话》所引那首“壁间诗”和王士禛晚年在笔记中追忆的那首绝句得以偶然流传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尤显珍贵,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特殊的文化遗存。

上文所引《菩萨蛮》虽然很可能不是出于李白笔下,但李白确实也写过不少“驿壁诗”,如那首著名的《题宛溪馆》就是题写在安徽宣城宛溪旁边驿馆驿壁上的诗作。王勃、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唐代重要诗人几乎都写过“驿壁诗”。刘洪生编著的《唐代题壁诗》一书共选唐代各类“题壁诗”841首。^[22]驿壁成了诗歌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当然该书收录的“题壁诗”是诗名或诗中明确表明是题写在驿壁或寺庙、酒楼等墙壁上的诗,真正的题壁诗远不止这841首,像托名李白的那首《菩萨蛮》就没有收录。清代康熙年间奉旨编撰的《全唐诗》共收录唐诗48900多首,作者2200余人。唐代印刷媒体并不发达,也没有专门刊载诗歌的诗刊,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这么大量的唐诗是怎么在当时传播开来,并得以流传后世的呢?驿壁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媒介。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写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23]由此可见在元稹生活的唐代,通过驿壁题诗再口口相传和抄写刻印传播,十分风靡。“唐代诗人在迁徙流转的过程中于驿亭邮壁所写之自己诗作或友人诗作,即以驿站为传播源,成辐射状态广为传播,驿站便成为诗歌的中转站,发挥出强大的传播功能,成为重要的诗歌集散地。”^[24]这是一种没有官方推崇和提倡,而是借助中国古代强大的驿传系统衍生的自发性、民间性的文化传播现象。在现代通信手段诞生之前,传播离不开交通。英语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最初就曾被翻译成“交通”,看来中国人在脑海里形成传播概念之前,交通文化已根深蒂固。

驿站或驿壁并不只是对唐诗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实早在驿传制度确立时起,驿壁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驿壁诗”也不是在唐代才开始出现,有学者考证魏晋南北朝驿传制度的发展促进了诗歌的异地传播和南北诗歌的交流,催生了“行旅诗”“送别诗”等诗歌体裁,“成为唐宋时期繁荣的馆驿诗创作的先声”^[25]。晋唐以下,驿壁诗和驿壁文学经久不衰。清代查慎行有一本诗集名为《题壁集》,收入他从北京南归途中纪行的60首诗。他在诗序中写道,偕友南下,“日有唱和,旗亭喉馆,污壁书墙,率多口占之作,本不足存,存之所以记行迹也。”^[26]驿馆的“污壁书墙”是古代文人的情感寄托和交流平台,记录的是他们的萍踪浪迹和点滴所悟,传播的是亘古不变的民族文化精神。“我们读古人的驿壁诗,可以认识当时的世态人情,可以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而驿传制

度、行旅条件、乡土意识和文学情趣也都可以通过这些诗句得以反映。”^[27]驿壁搭建起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播空间。

用荷兰文化地理学者安西·帕西的话来讲,媒介可以成为地方和区域文化的创造者。^[28]驿壁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驿壁是驿站这一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驿站又是特定的地理方位和周边自然环境中的一个节点,因而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驿壁离不开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空间背景。驿壁因其信息传播和文化对话功能成了所在驿站的一处人文景观。驿壁的阅读空间是驿站,驿站固定而封闭的空间、集体阅读的氛围使“观看题壁”转变成一种仪式化的文化接受行为。“立马邮亭看题壁,谁能不动故山情”^[29],经停驿站的行人在驻足观看、欣赏驿壁上的诗文时达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在亲身参与驿壁诗文的题写和传抄等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中,完成了以驿站为中心的地方文化——驿壁文化——的创造。驿壁文化体现了古代驿行者等特殊群体的审美情趣或价值观念,驿壁文化的发展又与驿站所在的地理空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有助于地方身份的强化和地方文化的构建。驿壁文化以诗文歌赋的形式,生动地描写沿途的地理风貌、民俗世情、幽怀意趣、苦旅乡愁,充分体现了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人与空间的流动性和相互关系”^[30]。驿壁上的诗词歌赋、传奇典故沿着驿站传播开来,文化也在国家的疆域范围内流动起来。驿行者在感知地理范围的现实空间的同时,探索文化范围的想象空间。很多以驿站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地方文化至今仍是所在地的文化名片。例如,河南驻马店市驿城区、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都将驿站文化作为地方文化的标志,江苏高邮市的孟城驿、河北怀来县的鸡鸣驿城以及湖南祁阳市的浯溪碑林等与驿站、驿壁相关的遗址都是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

三、精神交往空间:跨时空的对话与地方共同体的想象

驿壁也是古代文人精神交往的媒介。他们在驿壁上诗词唱和,神交倾慕,点评臧否,搭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白居易与元稹通过驿壁交往,惺惺相惜的例子在古代文人交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被朝廷派往剑南东川巡察,行至陕西周至县西南的骆口驿,在驿壁上看到了好友白居易等人的唱和诗,欣喜之余在旁边题写上自己的感悟:“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31]在诗题下又写有题注:“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31]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文人盛行在驿壁题诗,并互相唱和,交流情感,进行文化对话;另一方面也说明元稹本人在旅途中痴迷观赏“驿壁诗”,将其当作一种休闲消遣的方式。不久,白居易又经过骆口驿,见到元稹的题壁诗,欣然写下一首《骆口驿旧题诗》:“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32]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元稹自剑南东川返回长安,经过武关时题了首《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在驿壁之上。后来白居易来到此关,见到老友题写的诗,便又跟了一首:“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33]在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的中唐,“驿壁诗”见证了元白二人深厚的友谊。他们跟驿壁有关的故事还没完。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元稹由江陵回长安,走到蓝桥驿,题了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的诗于廊柱,希望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路过此驿站时能看到这首诗,与他唱和交流。刘、柳、李三位诗人是否经过蓝桥驿,又是否见到了此诗已无可考。但白居易后来贬官南下江州时,路过蓝桥驿看到这首诗,感慨不已,写下《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34]这表明通过寻觅驿壁诗来获知友人的近况和行踪,又通过在驿壁上题诗进行文艺切磋和情感交流是古代文人通常的做法。元稹刚被召回长安,又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刚到通州界面,他在一个叫江馆的驿站里

休憩时,偶然发现廊柱上题有白居易的诗,倍感亲切,当即写下一首《见乐天诗》:“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31]元白二人通过驿壁题诗实现跨越时空的精神交往和文化交流,也成就了文学史、文化传播史和文人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像元白二人这样通过驿壁诗进行交往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交往既有友人“同路不同时”的惆怅,也有“见诗如见君”的惊喜。驿壁成了文艺切磋和情感交流的媒介和平台,虽然没有当前微信朋友圈的即时性,但却有着相似的互动性。此外,比微信朋友圈更多了些时间的积淀和情感的凝聚。

在逆旅之中,看到驿壁上旧友的名字和诗文,心底自然会涌起一股“他乡遇故知”的温情。如武元衡在《见郭侍郎题壁》诗中写道:“万里枫江偶问程,青苔壁上故人名。悠悠身世限南北,一别十年空复情。”^[35]欧阳詹在一次途经湖北秭归某驿站时,看到了亡友李观题写在驿壁上的诗句,不禁萌发物是人非的感伤,在旧题旁题诗一首:“旧友亲题壁上诗,伤看缘迹不缘词。门前犹是长安道,无复回车下笔时。”^[36]驿壁成了超越时空阻隔的凝聚文化精神的物质存在,文人们以此为媒介实现心灵沟通甚至生死神会。

驿壁的媒介作用不只提供了让旧友“聚会”的场所,也能让素不相识的文人因驿壁上文字传播的信息而产生欣赏和共鸣。据《耆旧续闻》记载:“(姚嗣宗)尝题诗于关中驿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东坡见而志之,后闻乃嗣宗诗。”^[37]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的诗句只因“发表”在驿壁之上,竟然引起了大文豪苏东坡的关注。《湘山野录·续录》还讲述了“姚嗣宗奏补职官”的故事:“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有‘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又一绝‘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春昼眠’之句。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19]姚嗣宗因题写驿壁上的两首诗,竟被破格提拔任用。这说明在古代处于交通要塞处的驿壁是传播力很强的媒介,在上面发表作品可以极大地提高本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宋代思想家朱熹在《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一文中提到了自己与驿壁诗的渊源:

予顷年经行顺昌,憩篔簹铺,见有题“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之语于壁间者,三复其词而悲之,不知题者何人,适与予意会也。庆元丁巳八月七日,再过其处,旧题固不复见,而屈指岁月,忽忽余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间偶读此书,并感前事,戏题绝句:“鼎鼎百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篔簹壁上诗。”^[38]

一个名叫篔簹铺(现属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的驿壁上无名氏题写的16字牢骚话,竟然让朱熹感同身受,产生强烈共鸣。40年后再次经过此驿铺时还特意去寻找“旧题”,并深有感触地写下一首绝句作为回应。驿壁成了文人们内心情感寄托和交流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一媒介,相识的、不相识的文人们在匆匆旅途之中实现精神交往和思想共鸣。

驿壁为古代文人们搭建起一个在身边的、面对面的社会关系之外的另一个虚拟的社交平台。文人之间依托驿壁进行平等的、自由的文化对话。一个个驿站以点线连接的方式拓展了驿壁媒介覆盖的地理空间,以“共时并置”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景观、情感和思想,带来同时代人跨越地域、超越空间的深度心灵共振和文化交流。而以他者身份参与阅读的后时代人则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感同身受的体验”,有学者将这种传播效果称之为“共时性并置思维运用于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奇观效应”^[39]。

作为一种地理媒介,驿壁对于地理的反映并非通过地名、方位或地理风貌来机械地再现,而是从对远方亲友的思念、故园故国的归属感、不同地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等层面展开空间意义的建构。这种建构很多时候是通过文化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实现的地理想象。驿壁信息内容所再现的形象,更多是在人们观念层面产生影响。其中有关驿站及其周边景观的描写能够刺激驿行者“地方共同体”的想象,用现在的话说,驿壁在驿行者心中构成了某种文化特质较为稳定的“地理信息表征系统”。驿壁可以形成某种文化意义共享的地理空间。这也是元稹、白居易等文人通过驿壁交往的意义所

在。姚嗣宗因驿壁题诗被赏识提拔、朱熹对无名氏题诗惺惺相惜等,也说明文人之间通过驿壁实现的精神交往,依赖于驿壁作为地理媒介的实体形式,也依赖于驿壁符号化的文化传播功能。通过驿壁的承载和传播,才能使抽象的意义具有可表征性和可传播性。驿壁成了熟人相遇或陌生人“相识”的聚居地。可以说,一块驿壁不仅仅是一块具有自身实体空间的“地方”,还在驿行者心中构建起一块充满文化元素和心理期待的想象空间。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者提出的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便是认为空间生产是一种媒体和社会实践的结果。作为一种媒介属性与社会实践结合的“空间生产”,围绕驿壁的传播活动依托覆盖全国疆域各个角落的驿传系统而展开。驿壁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实现意见的表达、文化的凝聚和精神的交往。驿壁是不能移动的,但传播驿壁上文字和信息的驿传交通却是移动的。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等西方媒介地理学者将关注点聚集在电子媒介如何构建日常现实地理与虚拟地理的新体验。其实在电子媒介和近代新式地图出现之前,这种既打上驿站当地人文地理印记,又经由受众传抄、吟唱、刻印,实现跨地域的信息扩散和文化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想象,还促进了文化本土性的构建。驿行者在“长亭连短亭”的行走中,进行着日常现实地理的感知和对未知地理的想象和期待。

本文以留传至今的古人驿壁诗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窥探古人借助驿壁这一“空间过程的媒介”展开的意见表达、文化传播和精神交往,并将这些社会行为作为一种体现“媒介—人—地理”互动的“空间性实践”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发现,驿壁的传播活动与地理时空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既相互照应又相互生产的关系。驿壁这一媒介既是所属的驿站及其周边地理空间的产物,也在对所属空间进行媒介化的解释。每一块驿壁都是独一无二的媒介存在,它强调了其所在驿站独有的“地方感觉”,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感知和想象,凸显空间媒介化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流动,驿行者穿行的空间不断变化,与空间直接关联的地方——驿站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更迭变换,人文内涵丰富的景观在驿壁媒介的呈现下新意迭出。在充满张力的“媒介—人—地理”的理论框架下,可以绘制出一幅幅包含职业、阶层、权力、种族、审美情趣等要素的“意义地图”。驿壁加深了驿行者与媒介之间的“混沌纠缠关系”,驿行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内容的受众,而是深度地参与了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驿壁具备澳大利亚文化学者斯科特·麦夸尔提出的“地理媒介”(geomedia)与地理空间耦合和以人的行动赋予空间以“公共性”等特征。^[40]驻足在驿壁之前阅读驿壁诗等信息内容,是一种典型的“仪式观看”。以驿壁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体现着一种情感共识强度较大的“在场性”,营造出一个“天涯若比邻”的“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在不同的时间,驿行者以驿壁为媒介“共享”一个经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公共空间”,在诗文往来的直接互动和评论、传抄等间接互动中,分享特殊的共同经验,新的共识感得以形成。围绕驿壁展开的所有传播实践一方面增强了驿行者在空间移动中建立和维系他们与远方朋友或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朋友”的联系;另一方面,在阅读、题写、赞赏、传抄等活动中重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锚定驿行者与“这里”和“此时”的联系,建立起对驿行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本文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驿壁媒介的精神交往和地理想象进行考察,更多的是从精神交往和文化建构方面展开论述,主要依托现存的古代诗文资料。囿于实物资料的缺乏,本文对古代驿行者地理空间想象的论述仍较薄弱,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科学考证。驿壁作为一种地理媒介,是如何在驿行者心理层面实现空间想象的?这种空间想象与精神交往又有怎样的联系?驿行者的空间想象除体现在驿壁诗文的传播这一文化传播层面,是否在社会、政治等层面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者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李彬.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9-49.
-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 文物,2000,5:41.
- [3] 李昉. 太平御览(卷五九三,文部九). 北京:中华书局,1960:2670.
- [4] 孙朋朋. 宋元时期粉壁社会功能的演变. 宋史研究论丛,2019,1:379-391.
- [5] 徐燕斌. 周秦两汉法律“布之于民”考论. 法学研究,2017,6:192-206.
- [6] 徐燕斌. 唐宋粉壁考.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5:145-153.
- [7] 杨军. 宋代榜文文书副本的复制方式. 档案学通讯,2015,3:88-91.
- [8] 邵培仁,潘洋辉. 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31-136.
- [9]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北京:中华书局,1959:341.
- [10] 佚名. 名公书判清明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7:547.
- [11] 赵令畴. 侯靖录//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第2859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58.
- [12] 张孝祥. 于湖集//纪昀,永瑆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562.
- [13] 彭乘. 墨客挥犀//赵令畴,彭乘. 侯靖录 墨客挥犀 续墨客挥犀. 北京:中华书局,2002:323.
- [14] E.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Pion,1976:3-5.
- [15] 段义孚. 恋地情结. 志丞,刘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
- [16] 索杰.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陆扬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
- [17] 李白,杜甫.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长沙:岳麓书社,1987:260.
- [18] 孟浩然. 孟浩然集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85.
- [19] 文莹. 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 北京:中华书局,1984:15;15;15,76.
- [20]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 北京:中华书局,1980:509.
- [21] 王士禛. 香祖笔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0-41.
- [22] 刘洪生. 唐代题壁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23] 元稹. 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 白居易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2:1.
- [24] 吴淑玲. 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 文学遗产,2008,6:36-44.
- [25] 吴大顺. 魏晋南北朝邮驿的私人化倾向与诗歌异地传播. 学术论坛,2011,4:80-84.
- [26] 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4.
- [27] 王子今. 中国古代的驿壁文学. 文学遗产,2012,6:36-48.
- [28] A. Paasi. The Media as Creator of Local and Regional Culture. Report on a Joint NordREFO/OECD seminar in Reykjavik,1989:151-165.
- [29] 刘应时. 过炼山//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卷一〇八)//纪昀,永瑆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4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644.
- [30] 范志忠. 转向地理:当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视域——评邵培仁专著《媒介地理学》. 当代传播,2011,2:107-108.
- [31] 元稹. 元稹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4,244.
- [32] 白居易. 骆口驿旧题诗//白居易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2:217.
- [33] 白居易. 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白居易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2:242.
- [34] 白居易. 蓝桥驿见元九诗//白居易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2:241.
- [35] 武元衡. 见郭侍郎题壁//彭定求. 全唐诗(第十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0:3579.
- [36] 欧阳詹. 睹亡友题诗处//彭定求. 全唐诗(第十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0:3910.
- [37] 陈鹄. 耆旧续闻//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第2776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39.
- [38] 朱熹. 晦庵集//纪昀,永瑆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769.
- [39] 李蓉,张晓玥. 当代语境中的媒介地理学思考. 江淮学刊,2007,1:107-110.
- [40] 斯科特·麦夸尔. 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潘霁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1.

Post Wall as Media :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Wen Yuanzh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College)

Shen Yayuan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College)

Abstract: As a "regional media" or "geographical media", post wall is a unique media form derived from the powerful post transmiss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nd is a public and regional place to express opinions. The dissemination of post walls is a unique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with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ang and Song poetry spread widely relying on post walls. The post wall is also a medium for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mong ancient literati, where they mad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that brok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The interaction and overlap of "media-people-geography" have emerged on the post wall. The post wall allows thousands of strangers to complete a "ritual" of reading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forming a new sense of consensus, and constructing an imaginative space full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Key words: post wall; post communication; Media Geograph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2-14

■ 作者单位: 文远竹,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320
沈亚圆,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925

■ 责任编辑: 肖劲草